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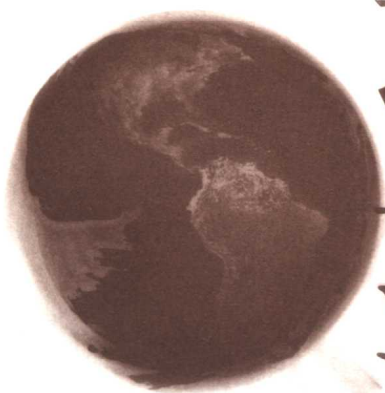
[加拿大]

马乔里·格里芬·科恩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编著

段保良 译

本书收录的十二篇论文，涉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外来劳工和全球正义等问题，对全球新秩序提出了质疑，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弱势群体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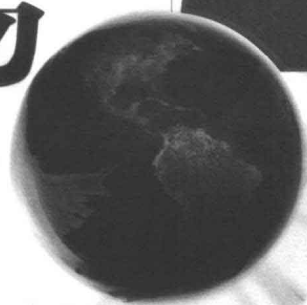


全球化 动荡

华夏出版社

全球化 动荡

〔加拿大〕马乔里·格里芬·科恩 编著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段保良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动荡/(加)科恩,(加)麦克布莱德编著;段保良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

ISBN 7-5080-2390-0

I.全… II.①科… ②麦… ③段… III.经济——一体化——研究
IV.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845 号

Marjorie Griffin Cohen and Stephen McBride: *Global Turbulence*
Copyright © 2003 by Marjorie Griffin Cohen and Stephen McBrid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由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于 2003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3-8875

全球化动荡

[加]科恩 麦克布莱德 编著

段保良 译

策 划:陈小兰

责任编辑:李雪飞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开

字 数:200千字

插 页:14

定 价:2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撰稿人简介

杰弗里·埃尔斯

加拿大弗蒙特州科尔切斯特市圣迈克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弗蒙特大学加拿大研究所副教授。著有《挑战传统智慧：反对北美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和群众集会》（1998年）以及有关加拿大政治动态、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运动等若干方面的论文。

奈杰尔·博伊尔

克莱尔蒙特市皮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加利福尼亚欧盟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克大学博士，曾执教于牛津大学，主要致力于福利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研究。

马乔里·格里芬·科恩

经济学家，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系、妇女研究所教授，“改善妇女状况之国家行动委员会”、“反对自由贸易联盟”及“替代性政策方案研究加拿大中心”等机构的理事会成员。主要作品包括：《19世纪安大略地区妇女从业、市场与经济发展》（1987年）、《自由贸易与妇女从业前景》（1987年）、《从公共物品到私有制剥削》（2001年）、《加拿大妇女问题》（两卷本，合著）（1993年，1995年）。

彼得·格雷夫

蒙雷阿勒尔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在魁北克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经济方面有研究论文数篇，见《政治经济学研究》（2001年）、《社会与政治》（1999年），其论著《政策与政治》即将出版。

安德鲁·格兰特

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博士研究生，哈利法克斯市达尔豪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曾多次参与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诸如“国际研究协会”和“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举办的研讨会，亦是达尔豪西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近年来主要从事非洲的发展、民主化、内乱、暴力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研究。

洛伊斯·哈德

艾伯塔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讲授加拿大政治经济体制、性别与政治等专题。主要研究以税收支出来实施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模式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其作品包括：《后现代处境中的社会福利政策：早期印象》〔见《加拿大社会福利政策评论》（2000年）〕；《社会公民往何处去？》〔参见布罗迪与特林布尔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21世纪的政治策略》（即将出版）〕。

安尼尔·希拉

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系、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关注拉丁美洲的经济和能源政策，1998年出版了专著《拉丁美洲的理念与经济政策》。

蒂莫西·利姆

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专攻东亚政治经济体制。其主要著作有：《理解全球政治经济新体制》、《比较思维：比较方法与理论之导论》。

桑德拉·麦克林

哈利法克斯市达尔豪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非洲的治理危机》编者之一，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加拿大外交政策》、《第三世界季刊》、《加拿大发展研究期刊》、《新政治经济学》、《当代非洲研究期刊》等杂志上，并被数本文集收录。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教授，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广泛领域内均有论著。近来主要致力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协定对国内政治和制度的冲击，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持久度。其主要著作有：《范式的转变：全球化与加拿大政府》（2001年）、《全球化及其导致的不满》（2000年，与约翰·怀斯曼合编）。



列奥·潘尼切

约克大学政治学系的杰出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研究员，《社会主义年报》编辑。其主要著作有：《议会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厂激进主义的终结》（1997年）、《加拿大政府：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权力》（1997年）。

克里斯·罗伯茨

多伦多市约克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正在完成对加拿大战后汽车工业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工会、全球化和竞争等领域。

拉维·罗伊

2000年获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任教于里弗赛德市加利福尼亚大学、富勒敦市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主要研究美国和英国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规范信念体系的作用。

蒂莫西·肖

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主任，30年来一直任教于达尔豪西大学，曾任尼日利亚、南非、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访问教授。曾获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外交国际贸易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联合国、联合国大学等机构的研究经费。近年来有论文发表于《加拿大外交政策》、《国际瞭望》、《新政治经济学》和《第三世界季刊》等杂志。

利厄·沃斯科

加拿大女权主义政治经济研究会主席，多伦多市约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约瑟夫·阿特金森自由与职业研究院成员。著有《临时工作：不稳定雇佣关系的性别原因》（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0年），与华莱士·克莱门特编著《变化中的加拿大：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麦吉尔女皇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致谢

本书收录的绝大多数论文均首次提交于 2001 年 7 月西蒙弗雷泽大学召开的“全球化动荡：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要由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系承办，由博格基金会、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西蒙弗雷泽大学资助。我们将此次会议上最优秀的论文，及其他几篇得到授权的文章，经过广泛讨论与修订，将它们结集成册出版成书。在此，谨向促成本次会议召开以及协助本书出版的所有人士、机构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特别要感谢玛格丽特·马纳里和兰迪·德勒夫兰在编辑、排版等方面的鼎力相助，还要感谢阿什盖特出版社的基尔斯丁·豪加特、帕梅拉·伯特伦以及丛书编辑蒂姆·萧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此书是完不成的。

马乔丽·格里芬·科恩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目 录

撰稿人简介

致 谢

001 ————— **第 1 章 导 言**

011 ————— **第一篇 国家目标和权力的变化特征**

013 ————— **第 2 章 在国内开始(与结束)的全球化**
——恢复国家的参与
列奥·潘尼切

029 ————— **第 3 章 作为权力体制的国际经济协定**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046 ————— **第 4 章 国家参与的管制博弈**
——以部门政策应对全球化
安尼尔·希拉

067 ————— **第 5 章 税收支出**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福利政策？
洛伊斯·哈德

083 ————— **第 6 章 国家政治活动与全球化**
——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有关青
年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新自由主义
政策
奈杰尔·博伊尔 拉维·罗伊

第二篇 应对全球化动荡的战略

- 101 —————
- 103 ————— **第 7 章** 质疑新自由主义
——跨国抗议的政治经济学诠释
杰弗里·埃尔斯
- 121 ————— **第 8 章** 工会与竞争民族主义
——千镜之屋
彼得·格雷夫
- 141 ————— **第 9 章** 围绕非洲内战中的钻石和石油问题兴起的跨国联盟
安德鲁·格兰特 桑德拉·麦克林
蒂莫西·肖
- 158 ————— **第 10 章** 外来劳工与韩国民间社会
——全球动荡时代的权力研究
蒂莫西·利姆
- 176 ————— **第 11 章** 塑造“最佳做法”？
——工会对北美汽车产业中的精益生产的回应
克里斯·罗伯茨
- 195 ————— **第 12 章** “体面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的角色变化与争取全球社会正义的斗争
利厄·沃斯科

马乔里·格里芬·科恩

斯蒂芬·麦克布莱德

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动荡一直是世界发展的永恒主题。历史上，全球动荡表现为不同文明、不同思想体系、不同政治目标之间的冲突。20世纪，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法西斯和纳粹的出现所导致的动荡。当然，美苏对峙也引起了极大的动荡。最近，因9·11事件及伊斯兰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观念分歧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凸显了不同思想信仰体系之间的深刻分歧。

不过，本书不拟讨论文化或文明冲突引起的动荡。本书讨论的动荡，是指由全球一体化所造成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错位。全球化过程表现为思想和行动的单一化过程，它基于华盛顿产生的“共识”，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应当根据惟一的一种经济体制来决策和行动。这种经济体制以美国模式为蓝本，扩张到全球。虽然就目前而言，它在国际经济法的编纂方面尚属起步阶段，但它背后有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说一体化导致动荡，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观不相符，因为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冲突。那些欲将单一的经济政策覆盖全球的人士，或许正是想实现世界大同。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引发了严重的错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无数人士为建立可靠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球化的政策和制度，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化事业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变得越来

越糟，就连那些从技术上讲有望取得成功的国度里，人们体验到的贫富差距也在惊人地增加。

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人们常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穷国的经济发展突然变慢了，而那些最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则完全停滞了。即使在那些有望取得进展的地方，除少数几个最富裕的国家而外，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这或许是幸福最明显的标志）也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同样，在中等发达国家和穷国，减少婴儿死亡率和发展文化教育的进展明显地放慢了速度。

人们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了然于胸，并且也知道，这些变化在加速反映的是在所有决策过程中，市场原则有所强化。不过，在现实层面上，即使是富国也会有沉重的挫折感。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华盛顿共识”似乎表明，世界各国，如果要想发展出一套统一的经济制度，但是无论各个国家的目标、需要和国家力量如何，有些东西总是不可避免和无法动摇的。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许多新闻记者和学界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从一开始起，“全球化”这一术语就既具有经验的特征，又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从经验层面上讲，全球化是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时代。而在经济层面上，最关键的则是要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水平，撤销对金融和资本流通体制的限制，并产生与跨国公司相关联的全球生产网络。在政治层面上，苏联的解体似乎标志着一种试图替代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方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战无不胜，以及对“历史之终结”的预言。再次得势的新自由主义者，急不可耐地要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市场更加自由，政治制度，如国家，所扮演的仅仅是一种推动改革的角色，文化上，要达到的结果据说是一种同质化了的的文化碎片的比较紊乱的混合（Waters, 2001 年；McBride, 2001 年，第 2 章）。

然而，“全球化”这个术语远不止是描述性或经验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是要描述这个世界，而且还志在改造这个世界。全球化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许下了许多豪言壮语（Steger，2002年，第3章）。其最重要的是声称，一切背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之下的决策，都取决于市场的良好运作。这意味着，为了有利于市场化的进程，国家的作用，至少从修辞上讲，应该受到限制。另一项声称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抗拒的。这意味着国家、个人和群体的抵制都纯属徒劳，因为只有适应全球市场的规则才是惟一合理的、可行的选择。与这一项声称相关联的一种观念认为，是市场和技术导致了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人并不是“全球化”的驱动力。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一项重要的声称是，全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人文的意义上讲，都将受益于全球化（从经济上讲是所谓的正和博弈，从人文的意义上讲是民主制度）。这项声称与市场永远是有效的、竞争性的和民主的这种潜在的假设有关。一旦采用自由市场，就会在全世界建立起民主制度，这项承诺，使得任何用“好”或“坏”来描绘全球化的尝试都将成为徒劳。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全球化永远是好的，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讨论的余地。全球主义者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构建国际制度框架的强大力量。国际制度的规定，使得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在各国内部大展拳脚。

本书的编者正是要挑战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全球化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其间必然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无序和动荡。我们将通过本书表明，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大谬不然。与全球主义之意识形态的“确信”相比，对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如何，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有何作用，是否有可能抵制它或者用其他方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等问题，本书将给出极为不同的答案。本书将主要集中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第一，讨论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第二，表明各主要群体如何评估动荡的全球化气候，以及如何制定策略，如何应对市场和规章制度的变化。

本书的第一部分旨在表明，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促进因素，而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全球化力量的受害者。国家的作用确实在不断改变，但诚如列奥·潘尼切在第2章中所阐述的那样，国家最

终由“从福利国家，转变为到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便利和监督的国家”。这说明，国家虽然在变化，但并不表明国家的权力和重要性在下降。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全球化正在进行，但“没有谁对之负责”的观点。潘尼切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并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威组织，它能为全球化的制度变革提供便利和监督。这种分析认为，假若国家本身是由民主权力所决定的话，那么，国家就会留有相当大的权力，它的未来并不是无法改变的。

国家的这种新角色，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相契合。自由主义者一贯强调强大而有限的国家。特别是，国家应当保护而非干涉市场运作。对于市场而言，由于必须要具备某种程度的经济规章制度，因此，应该非常谨慎地确保国家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之加以限制。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取决于新的国际经济协定的要求。达成新的国际经济协定的紧迫性表明，政治力量不尽相同的国家，仍可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而经济协定具有“准宪法”条款的效力，使得这样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现。

通过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可以在结构上重新强化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在此过程中，民主治理的可能性减少了。不管形式上的投票程序为何，国际经济协定要求各国在政治上建立一种“调控框架”，其结果必将限制民主的范围（Grinspun and Krekewich, 1994 年）。斯蒂芬·麦克布莱德在第 3 章中指出，这些协定规定了许多非民主决策过程所能涉及的事务。其结果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的决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活动范围之内，甚至连控制市场行为之后果的可能性也被严重地削弱了，剩下的仅仅是一种涂有几分民主色彩的自由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将民主囊括进自由主义范围之内。麦克布莱德认为，国家的决策能力减弱了，但他同潘尼切一样，又认为这种困境不仅会关系到国家自身是否愿意合作，而且也关系到国家能否领导人们走出这种困境。

政治仍然是关于何人于何时、如何得到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在民主的政治体制范围之内解决，而不应由外部力量来解决。很久

以前就有人认为,某些国家鼓吹全球化是为了某种利益。那些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国家,是希望通过重组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从中渔利。人们很容易就看出,全球化的好处是不均等的。它很明显地存在着输家和赢家。即便是在赢家当中,这种分配也是不均等的。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对于政治精英阶层来讲,就是可以凭借着国际竞争压力这一借口,不公正地作出使得国内某个特定的群体或阶层受益的政治决定。而这些精英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就会出现明显有利于政治精英阶层利益的后果。

本书认为,不同的政治抉择仍然存在。个别国家采用的政策,对于国内的人们来讲会有不同的结果。经验研究表明,尽管各国对全球化的体制都有所抵制,但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却是各不相同的(Hoberg, 2000年; McBride and Williams, 2001年; Reiger and Leibfried, 1998年)。安尼尔·希拉在第4章认为,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在决策方面具有持久的能力。然而,正如希拉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措施,这既取决于它对国内经济的看法,也取决于它所明确表达出来的国际战略。希拉对中观层面上的管制政策很感兴趣。在中观层面上,有能力的国家能够利用管制政策,实现国家的或部门之间的竞争。

在某些国内由新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交替执政的国家里,如果“左派”和“右派”的政策能趋向于一致,那么,人们通常会用国内政治的原因来解释这种趋同,而并不认为是由于全球化的无情压力所致。在第6章,奈杰尔·博伊尔和拉维·罗伊通过分析英国青年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一章以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在青年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政策连续性为根据,探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范式。这些政策很显然是根据国内的选择作出的,而不是因为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这再次强调了本书的大致主题,即国家是否采纳新自由主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决策问题。

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各样艰难复杂的办法,使其公民适应全

球主义的准则。在第5章，洛伊丝·哈德通过分析国家为了获得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从而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税收支出手段，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人们很容易地将国家的这种抉择归因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也可以很容易地将之归因于受到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然而，很有必要区分这两种影响，因为国内的政治家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尽管他们会说那些政策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必须采取的举措，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要对不良后果所承担的责任。哈德（用美国和加拿大的统计数据）指出，税收制度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手段，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试图减少国家对社会福利项目的直接资助和支持，会使税收制度的作用得到强化。那些支持以税收支出代替直接投资资助项目的人士争辩道，公民作为消费者，当他们通过市场来获取服务时，他们特定的需求会得到更好的满足。税收制度的重要性在增加的同时，公众们也讨论社会责任，即希望国家的社会福利计划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本书清楚地告诉人们，国家仍在“起作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说国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这不仅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当这种判断成为大众意识之后，就会使得人们无法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所能扮演的进步作用的关注，或许并不足以造成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但它留下了一个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即应如何看待全球化问题。

本书的第二篇集中关注国内和跨国联盟当中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看待全球化的，以及如何制定策略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动荡。这些群体心里很清楚，对于全球化来讲，尽管它覆盖的范围极广，却没有任何东西是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权力的产物——几乎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

权力的构成和使用场所的变化，意味着对于那些争取将世界从一种超级市场的阴影中解放出来的人们而言，他们的行动目标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伴随着全球政治文化和制度的激烈变革，某些国内是法治社会的国家其公司的行动目标也会逐渐变得令人难以捉摸。曾经在策